

李书敏 蓝锡麟 主编
巴渝文化丛书

巴渝 英杰 名流

傅德岷 李书敏 著



重庆出版社

李书敏 蓝锡麟 主编
巴渝文化丛书

巴渝 英杰 名流

傅德岷 李书敏 著



重庆出版社

BAYU YINGJIE MINGL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渝英杰名流/傅德岷,李书敏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

(巴渝文化丛书/蓝锡麟,李书敏主编)

ISBN 7-5366-6536-9

I.巴… II.①傅…②李… III.名人—生平事迹—重庆市 IV.K820.8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3572 号

巴渝文化丛书
巴渝英杰名流
傅德岷 李书敏 著

责任编辑 周显军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寇小平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44 千 插页 2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6536-9/K·343
定价:17.50 元



巴渝文化丛书

《巴渝文化丛书》序

李书敏 蓝锡麟

重庆出版社组织编纂的《巴渝文化丛书》，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持运作的“四加一”工程重点图书之一。它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分工撰写，力求大视野、多维度、广层面地系统展示巴渝文化的丰富内涵，不仅具有学理价值，而且有助于增进各方面人士对于巴渝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色和人文风貌的切实的了解，对于塑造重庆市的历史文化名城形象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巴渝地区位于长江上游与中游的连接带，自古与西之蜀、东之楚交融密切，共同构成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以降，巴与蜀比巴与楚联系趋紧，人们多习惯于将巴蜀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其共性看，自然有道理，但并不意味着巴渝缺乏个性。无论从祖系渊源、政区嬗替看，还是从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看，二者都既有大同，又有殊异。早在东晋年间，蜀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巴志》，便揭示了“江州（今重庆主城区）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今重庆合川市）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巴与蜀同属四川，是从北宋咸平四年





(1001)设置川峡四路开始的,并非自古而然。因此,正如长江下游的吴越畛域可以合而论吴越文化,分而论吴文化、越文化一样,长江上游的巴蜀畛域亦可以合而论巴蜀文化,分而论巴文化、蜀文化;在巴与楚交接地带,还可以论巴楚文化(荆巴文化)或大三峡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大时空内,对于地域文化进行不同层级的梳理和抉罗,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便于相互发明,相得益彰。

事实上,前人关注巴渝文化,至少比四川建制早千余年。先于《华阳国志》,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即已经述及“巴俞宋蔡,淮南于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注说:“巴西阆中有俞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尔后的《晋书·乐志》、《宋书·乐志》和《隋书·音乐志》,都对巴渝舞作过描述。降及唐、宋、元、明、清,历代的骚人墨客歌咏巴渝不绝如缕,足见决非标新立异,另立门户。但由于巴渝地区历代行政隶属关系更迭偏剧,重庆主城直至南宋中期才由单一的行政、军事职能向着兼容的经济、社会职能转化,“多劲勇,少文学”的风习长期存在,巴渝文化固有的丰富涵蕴多被埋没,鲜为人知。还有一些成为耳食口传之说,难免产生误读、误导。在重庆直辖前的若干年内,四川省和重庆市都有一些专家、学者力图更张,搜罗古籍,考证文物,对巴渝文化开展分门别类的研究,渐次超越前人,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一套丛书,就是要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有所承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历史是一种过程,文化也是一种过程,其间充满了变动,回溯性研究必须截取相对的静态。这一套丛书所指的巴渝地区,概以重庆直辖市的范围为准。个别涉及与此不尽一致的地界,作个例处理,随文交代明白。所涉时间上自远古,下迄当今,个别也可以迄于近、现代之交。第一辑的十本书,分别从历史学、考古学、



神话学、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建筑学、地理学、旅游学等角度,述说了巴渝历史沿革、文物古迹、山水名胜、民俗风情、诗词歌赋、戏剧乐舞、神话传说、巴渝古镇、掌故集锦和英杰名流。所涉人物除《巴渝诗词歌赋》略有例外而外,均重在巴渝儿女——一指巴渝本土人士,二指尽管出生地不在巴渝地区,但一生中主要经历和人生归宿却在巴渝地区的历代人杰。述说一律以时序为经,以地方、类别、事件、人物为纬,标写时间、地点,均按学界通例。其中诗词歌赋、戏剧乐舞两本书,在重庆市这样专题述说还是第一次;其余的八本书,先前虽有相关题材的专著,但取材之新之富,立言之允之洽,无不体现各有其追求。纵或其间还有敝于一孔一得处,对相关话题,总能提供一种观照。

早在两百多年前,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便在《初民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复合整体”。据其审视巴渝文化,很显然,只凭一套丛书绝然不能解读它的所有的奥秘。而研究巴渝文化,乃是弘扬巴渝文化必不可少的前提,那是一个宏大的、浩繁的系统工程,迫切需要多方合力,相与建功。这一套丛书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借此更希望,后续之作、跨越之作、鼎定之作次第产生。

2003年2月23日





前言：巴渝沃土育英才

傅德岷

巴渝大地幅员广阔，物产丰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巴国极盛期的疆域就为：“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夔（Bó）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接黔涪。”^①即以今重庆为中心，兼括陕南、鄂西、湘西北、黔北在内的区域。20世纪90年代重庆直辖以后，巴渝东邻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连四川的泸州、内江、遂宁，北接陕南和四川的广安、达川一带，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000多万，是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带。几千年来，巴渝大地人才辈出，群英荟萃，构成一道璀璨的迷人风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经济实业家，犹如天上的繁星，不可胜数。故巴渝大地的中心城市重庆一直是中华古国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体的重镇。正如邓小平指出：人才问题始终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要“尊重知识，尊

①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25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



重人才”。^①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有了高素质的人才,则国兴,地区兴,科技与企业兴;否则,则国弱,地区弱,科技与企业弱。巴渝大地历代人才辈出之景观,正是巴渝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达之标志。那么,巴渝地区为什么会出现人才辈出的现象呢?我以为是和巴渝大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区位优势、军政中心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因素分不开的。

(一)奇特的自然环境

巴渝大地地形奇特,多险峻的高山和起伏的丘陵。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沿江河山脉起伏,形成南北高、中间低,从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的以丘陵、低山为主的地貌。作为主要山脉的巫山、大巴山和武陵山,海拔高度均在1000~3000米之间。长江在奉节和宜昌间横切巫山,形成壮丽的三峡,大巴山和武陵山均山势高陡,绵亘千里。因此,巴渝大地的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坝不足10%。

巴渝大地江河纵横,水网密布。除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嘉陵江、乌江、大宁河之外,还有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0条,流域面积在30到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436条。长江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境,与南北向的嘉陵江、渠江、涪江、乌江、大宁河五大支流及上百条中小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②

巴渝大地森林资源丰富,野生动物繁多。属国家一、二、三级保护的高等植物有59科、105属、127种,经济作物、中药材和矿产资源有:“桑、蚕、麻、纻(zhù)、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蒟、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7页。

② 参阅薛新力主编:《重庆文化史》,重庆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6页。



戟、天椒；竹木之瓊者有桃支、灵寿。”^①野生动物有灵长类及华南虎等。

巴渝大地丰富的资源为巴渝儿女的生存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但险峻的高山和低凹不平的土地、汹涌澎湃的江河，又为巴渝儿女的生息、繁衍设置了重重障碍。为应付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外来势力的掠夺，他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水斗，与野兽斗，与人斗，比之子平地区的人们，他们的付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与以渔猎、粗耕农业为主的生活，必然养成巴渝儿女刚毅坚韧、尚武好勇的民族性格。所谓“聚之则生，散之则亡；合之则强，分之则弱”的生存态势。《华阳国志·巴志》对此也作了描述：“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憨厚”，^②“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③，“天性劲勇，陷阵锐气喜舞。”^④“故曰‘巴有将，蜀有相’也。”^⑤这种耿直尚武之风自古相传，历代不衰。早在远古时期，治水英雄大禹就与山斗，与水斗，导江疏河，以置九州；周武王伐纣之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⑥；战国时有舍身卫国的断头将军巴蔓子；三国时有严颜、甘宁的忠勇；明代有巾幗英雄秦良玉的豪直；近代有余栋臣等的反洋教；辛亥革命时期有邹容、邹杰的义烈；大革命时期有杨闇公、赵世炎等的英烈；抗美援朝时期有邱少云的韧烈；新中国有军事家刘伯承元帅和“两弹之父”聂荣臻元帅的忠直……总之，正是这种艰难险峻的环境铸就了巴渝儿女一代代的英杰。

（二）独具的区位优势

- ①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5页。
- ②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3页。
- ③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8页。
- ④ 转引自薛新力主编《重庆文化史》，重庆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8页。
- ⑤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90页。
- ⑥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1页。





巴渝大地位于我国西南部之长江上游，尤其是它的中心城市重庆，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它地扼蜀鄂之间，接滇黔之“南方丝绸之路”，通陕甘藏之隘，是联结西部东西南北之纽带。加上黄金水道长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五日，英人立德驾“利川号”小轮从宜昌上溯重庆，试航成功后，航运开通，它在区位优势上更显出龙头、窗口、辐射的作用。

龙头作用表现为：重庆是滇、黔、藏、蜀以及陕甘等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它带动着长江上游各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形成的重庆—宜昌—汉口—上海为主轴的长江水运贸易，以重庆为龙头，以上海为归宿。正如一位外商所说：重庆“由于它的特别优势的地理位置，是永远不会受到严重威胁的。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遥远的城镇，如成都府、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府、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川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到重庆，运来他们的土货——鸦片、药材、生丝、茶，并运回洋货。”^①据有关资料表明：四川出产的蚕丝、白蜡、羊毛、猪鬃、桐油，西藏的麝香、大黄，甘肃的山货等，都是经重庆沿长江航线向外输出。

窗口作用表现为：重庆又是外来物资、金融、技术的吸纳地。据历史资料记载：在19世纪末，整个四川的洋布进口由31家商号垄断，其中重庆商人有27家，他们通过代理人直接从上海进货^②。1890年，英商立德乐在重庆开设了第一家洋行；美孚石油公司在1910年进入重庆，建油库，建营业办公机构；金融机构也纷纷建立，除了国家银行、地方银行、钱庄、银号等以外，外资银行汇丰、麦加利也在重庆设点；长江下游地区的先进技术、设备也纷纷进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9页。

② 转引自周勇：《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入重庆设厂,就地取材,大牟其利。

辐射作用表现为:重庆对巴渝地区及西南广大农村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就巴渝地区而言,有600公里长的水域和大山区,重庆是山城和水城、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就大西南而言,云贵、青藏高原,更是险山恶水,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均受到极大的阻碍。因此,重庆成了东南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对内辐射的二传手,自然要承担起带动长江上游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重任。它依托自己的经济实力,在与周边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中建构了一种互动的经济网络。同时,先进的文化思想也经重庆辐射到内地。比如,“五四”时期,成都的《星期日》杂志曾报道说:“尔时世界的新潮正从大西洋里飞也似的翻滚而来,在东西大陆沿海的地方受了这一番震荡,都激越起无数波涛澎湃的声音。那雪涛似的长江,仿佛冲破了夔门—巫峡—滠滩的滩头,笔直的透到细流纵贯的成都,也微微发出一丝声响。”^①

巴渝大地独具的区位优势,使巴渝儿女在对外联系与交流中,最早具有商品意识和开放意识。比如,战国时期巴渝地区的酿制业(清酒)、堕林粉(化妆品)、制盐、冶铜、制陶、纺织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巴寡妇清,继承其家数世采汞矿和炼丹砂(硫化汞)的技术,经营有方而成巨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她家无丁可抽,便将积蓄的几万两白银捐给朝廷。“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②唐宋以后,巴渝的丝织业、制茶、造船等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繁荣景象,以致现代出现了航运巨子卢作孚。如果巴渝儿女没有经商致富的开放意识,巴渝地区繁华的经济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稳固的军政中心

① 转引自李新等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② 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91《货殖列传》。





巴渝地区的重镇重庆，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直是长江上游稳固的军政中心。约公元前13世纪，巴族的先祖廪君即辛巴人从湖北清江流域进入三峡地区，并在枳（今涪陵）称王。公元前1066年，巴人参加周武王伐纣之战，充当先锋，立了大功。周朝建立后，周武王封姬姓宗族于巴，赐子爵，巴子国建都在江州（今重庆）。公元前314年，秦灭巴国后，以原巴国之地建巴郡，郡治在江州（今重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国分为36郡，巴郡是其中一郡，直属中央。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设置为13刺史部，又称十三州，形成州、郡、县三级政制，巴郡属益州（成都）监察区，郡治仍在江州。东汉、三国、西晋，沿袭此制。南北朝时期，梁太清三年（549），武陵王萧纪于此置楚州。

隋朝开皇九年（589），废郡存州，取嘉陵江名“渝水”之意，改楚州为渝州。不久，又罢州为巴郡。唐武德元年（618），再改为渝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南平郡。乾元元年（758），又恢复渝州。经五代十国至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因国子博士南平僚人赵谔返乡，被人诬告“谋反”而处死，并以“渝”之古义有“变”之意，遂改渝州为恭州。1190年，赵惇封为恭王，后被册封为太子，即帝位，自以为是“双重喜庆”，升恭州为重庆府。

元至元十六年（1279），立重庆路总管府。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率军入川，于1361年被拥立为帝，建都重庆，国号大夏。1371年，朱元璋兵抵重庆，大夏国亡，恢复重庆，领三州十七县。清代因袭重庆之名，领二州一厅十一县。

清朝末年，英人仗其船坚炮利，于1890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于1891年被迫开埠为通商口岸。不久，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势力相继侵入，重庆逐渐沦为世界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1929年，重庆建市。1937年抗战爆发





后,大片国土沦陷,重庆以其独特的牢固的地理优势,国民政府于这年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1939年5月5日,升重庆为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新中国成立初,重庆为中央直辖市,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所在地。1983年,重庆成为经济计划单列城市。20世纪90年代,随着三峡工程的启动,西部大开发的需要,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第八届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立重庆直辖市。

重庆三次建都(巴国、大夏国、民国)、四次直辖的历史,充分证明其得天时地利之便,早就成为我国西部的一座稳固的军政中心。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政治家、军事家也就不断涌现出来。远古时的廩君,战国时的春申君黄歇,蜀汉直臣董允,大成丞相范长生,抗元(蒙)的余玠、王坚、张珪、黄花岗烈士饶国梁,蜀军都督张培爵,广州起义献身的游曦,川东游击队政委彭咏梧等。军政中心的城市地位又必然带动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名人荟萃,群英聚集。诸如唐诗赋家李远,开凿大足石刻的赵智凤、韦君靖,清代的苟金薇、龙为霖、钟云舫,现代学贯中西的吴宓,白屋诗人吴芳吉,实业家胡子昂,土壤学家侯光炯,以及抗战时期云集重庆的全国第一流的政治家、法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英才的出现与云集与军政中心的城市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四)复合的文化组成

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表现。首先,巴渝地区是个多民族聚居区,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賁(cóng)、苴、共、奴、獯(ráng)、夷、蜃(dàn)之蛮。”^①濮

①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8页。

族与百越族有亲缘关系,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活动在巴中地区。賸人,廩君之苗裔,又称板盾蛮,居长江流域、嘉陵江与渠江一带。苴人,巴人的一支,居巴郡北部至今广元一带。共、奴、獯族,今不详;夷獯族,居彭水、黔江、秀山、酉阳一带,与今苗、瑶等族有亲缘关系。多民族的聚居,各民族的文化必然发生碰撞与交融,形成多元的复合态势。

其次,巴渝地区不是多次移民之区。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移民:廩君巴人的进入;秦统一中国后中原民众的迁进,三国蜀汉时期北方与两湖人口的入蜀;明代明玉珍率红巾军建都重庆;清初所谓“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及各机关、各大专院校、各工厂的内迁和难民的流入;新中国成立后“三线建设”的工厂内迁……此外,巴渝作为“西南夷”之地,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惩处罪人充军和文士、官宦被贬黜之地。因此,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和科学技术,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巴渝地区文化的发展。

再从传统文化的内涵来看,儒释道文化在巴渝地区均有较大的发展和影响。理学是儒学的延伸,北宋时期理学在巴渝大地兴起。先是理学家周敦颐在合州(合川)为官,并开坛讲学,从学者甚众。接着,理学家程颐被贬谪在涪陵,在北岩洞点《易》、注《易》,著《伊川传》,涪陵学者谯定师从程颐学《易》,同修《易书》。诗人黄庭坚被贬黔州(彭水),赴涪陵专访程颐,共研《易》学。北宋末年,程颐门人尹淳来涪陵避居,建“三畏斋”,研习《易》学,收授门徒。而谯定又教出了胡宪、刘勉之、冯时行、张行成等一批著名学者。其中胡宪、刘勉之为闽中人,是朱熹之父朱松好友。朱松临终,“属其子熹受学于宪与勉之”,^①可见大理学家朱熹与巴



^① 见《宋史·胡宪传》。



渝学者的师承关系。

唐宋时期,巴渝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中原地区大批文人工匠入巴蜀,为佛教石刻艺术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而巴渝地区的佛教石刻尤为突出,有著名的大足卧佛、潼南大佛、合川大佛、钓鱼城卧佛等;明代增有江津大佛;民国年间增有潼南马龙山卧佛……,这些佛教石刻的兴起,为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道教盛在蜀,但巴渝地区亦有较大影响。道教祖师张道陵将老子的《道德经》与巫经以及当时流传的《太平经》结合起来,创立了天师正一道,因该教崇拜五方星斗及入教者需交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教。他们用符篆、咒诀、神水治病,用行气、导引、服食、房术等法教人长生。巴渝地区的先民信仰巫教,与道教之降伏鬼魔、拯救世人不谋而合。东汉末年,巴郡官吏贪赃枉法,激起板盾蛮等巴人的强烈不满,五斗米教巴郡教区道长张修,以行医传教为名,组织百姓,发动起义。与张道陵之孙张鲁率领的起义军一起,在汉中和巴郡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以后历代,道教的影响连绵不断。

复合的文化组成,使巴渝地区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巴渝儿女所受的文化熏陶与教育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多元的,综合素质较高,具有多方面的从政理财、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出现多位政治家、文学家、实业家。以明代而论,巴渝儿女在朝廷担任御史、尚书以上职务者就有蹇义、江渊、牟俸、李实、江朝宗、喻茂坚、夏邦谟、张佳胤、王应熊、喻思恂、喻思颢、程源等数十位,可见复合文化对于人才成长之巨大作用。

(五)官学、私塾、义学并举的办学模式

巴蜀地区的官学兴办始于西汉时期的“文翁兴学”。文翁开创了西汉的官学制度,他用学习成绩优秀者为吏,改任人惟“财”为任人惟“才”,提高了吏员的素质。文翁所兴之学属中等教育性





质,还有属于初等教育的官办乡镇学校。以后历代,承袭传统,乡镇学校和府州县学并存,培养参加科学考试的学子。到了宋代,在宋徽宗的倡导下,设立了专门钻研学术的书院,遍及各州县。书院有名师讲学,大都属于地方高等教育性质。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涪州(涪陵)的北岩书院、合州的濂溪书院、夔州的竹林书院、南阳书院。元末,大夏国明玉珍重视教育,“兴文教”,设立高等学府国子监,州县也开办学校。明代,巴渝地区的合州、铜梁、巴县与川北的南充形成四川的一个教育中心,著名学校有重庆府学、巴县县学。清代,书院林立,著名的有缙云书院、渝州书院(后改名东川书院)、长寿凤山书院、江北字水书院、江津书院、南川隆化书院、铜梁巴川书院、永川东皋书院、綦江瀛山书院、璧山合璧书院、合川合宗书院、夔州莲峰书院、梁山(梁平)桂香书院、石柱南宾书院等。民国以后,官学制度更趋完善,各级各类学校更加繁多。

私塾的兴办更早,春秋时代的孔子可说是私塾的创始人。私塾经历代发展,逐渐趋于规范。一般分为两类:一是“蒙学”,其任务是教授识字和基本知识;一是“经馆”,又称“精舍”、“精庐”,由经师大儒授课,专供年龄较长、知识较高的学生研究学问和准备科举考试之用。此外,巴渝地区的一些书院也是民办性质,且有名气。如元代的北岩书院;明代的凝道书院、朱凤书院,以及丰都的平山书院。这些民办书院,经费来自学生,更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学术氛围浓厚,为传播学术思想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义学多由地方官员、乡绅等捐资兴办,聘请教师,设馆教育贫穷子弟。义学属初等教育,生徒七岁入学,学习内容有四书、六经注疏、书法等。明清两代,巴渝地区的义学遍及城乡,仅巴县就有义学15所。义学对于传播文化基础知识和培养升入高一级学校的生员作了有益的工作。





官学、私塾、义学并举,使巴渝地区的教育在巴蜀一直名列前茅,不仅培养了宋代状元蒲国宝、冯时行,元代淹贯经史的贾元,明代“直声动天下”的邹智和“骨鲠英风”的刘蒞,清代《四库全书》总阅周煌等众多的名流学者,还在近现代输送了一批去日本、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这些人学成归来后均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同时,还涌现一批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如东川书院主讲周开封,蜀中名师李惺,兴教办学的张森楷、曾吉芝、汪云松及无产阶级教育家赵君陶等,这对于巴渝人才的培育与成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他还以譬喻的方式说:“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①可见,巴渝历代英才辈出之因就在巴渝大地有着人才长育出世的“民众”和“沃土”,这“民众”和“沃土”就是巴渝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融睦的人文环境。今天,巴渝地区的这些优势更加显著,更加突出,应该说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因此,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巴渝儿女在同自然与社会搏击中所表现出来的刚勇坚毅、重义守信、协作求新、团结奋斗的文化精神,虽处内地而不封闭,虽守一方而有开放意识,立足本土,胸怀天下,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更多的英才,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2002年10月于重庆工商大学翰苑

① 见《鲁迅杂文全集·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